

中國語文叢書

拼音形声字批判

中國語文雜誌社編
中華書局出版

中國語文叢書

拼音形声字批判

曹伯韓 拓牧 殷煥先 李鶴
陳力 王孔淵 魏茂書 爰居
楊煥典 龍鴻志 李仁等作

中國語文雜誌社編
中華書局出版

內容提要

研究文字改革的人当中，有些人主张采用附加意符的拼音文字，这种仿照汉字中的形声字的構造來設計的拼音文字叫做拼音形声字。这种文字跟汉字的主要区别是把声旁换成了拼音字母，跟纯拼音文字的主要区别是多了一种只表示意义而不发音的意符，这种主张是不正确的。本書收集了有代表性的两篇主张拼音形声字的文章，作为批判的对象。正面的文章約十篇，其中从各方面分析了拼音形声字的缺点，證明它是行不通的。在文字改革运动中，拼音形声字的观点是容易自發地產生的，本書是批判这种观点的有力的参考書。

拼音形声字批判

中國語文雜誌社編

六

中華書局出版

(北京東總布胡同57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17號

中華書局上海印刷厂印刷 新華書店總經售

*

787×1092 耗 1/25·3 21/25 印張·69 (KK) 字

1956年8月第1版

1956年8月上海第1次印刷

印數：1—11,000 定價：(7) 0.36 元

統一書號：9018.9 56.7·漢體

“中國語文叢書”編輯說明

《中國語文》雜誌創刊以來，陸續刊登了有关文字改革、語文科学常識、語文教學等等方面論文或資料，還介紹了苏联語言学家的一些著作。今后也還要繼續這一类的工作。為了便利讀者的參考起見，我們決定把這些文章分門別類，整理編輯，陸續出版單行本，總稱《中國語文叢書》。

同時因為我們的雜誌篇幅有限，有些理論上有價值的較長的稿件，不便刊登或不便全部刊登。為了補救這一個缺點，我們打算把這些稿件編到這套叢書裏面去，使它們能夠和廣大的讀者相見。

由於我們的雜誌印數有限，好多关心語文問題的同志們對已經出版的各期還沒有完全看到，或者沒法兒補買。有了這一套叢書。也許可以弥补這方面的缺憾。

這套叢書的編輯方針，正和《中國語文》雜誌一樣，主要是推進文字改革運動，普及語文科學知識。希望全國語文工作者給我們批評，並就有關問題展開討論，提供意見，使這套叢書的內容得以改進，逐漸充實起來。

中國語文雜誌社

1953，8，1。

目 次

关于标类拼音字(拼音形声字)的几点意見	曹作韓	(1)
从語义学的觀点來看拼音形声字問題	拓 牧	(13)
从文字跟語言的关系看拼音形声字	拓 牧	(28)
談新形声字	殷煥先	(42)
拼音文字要用偏旁嗎?	李 鶴	(57)
义符是要不得的	陳 力	(63)
給龍鴻志的一封信	王孔淵	(66)
对《拼音文字應該有义符》一文的意見	魏茂書	(69)
讀傅永康先生反对純拼音文字的文章以后的感想	爰 居	(72)
中國文字改革能走“新形声字”的道路嗎?	楊煥典	(75)
*		
拼音文字應該有义符	龍鴻志	(78)
拼音文字必須有类符	李 仁	(86)

关于标类拼音字(拼音形声字)的几点意見

曹 伯 韓

有一些研究漢字改革的同志，主張采用一种附加意符的拼音文字方案，这种文字是仿照漢字中間的形声字的構造來設計的，所以我們一向叫它做“拼音形声字”。这种文字和漢字主要不同之点只是把声旁換成了拼音字母，和純拼音文字主要不同之点就是多了一个意符。这个意符是不發音的，專門表示意义的，但它并不能真正准确地表示意义，而只是表示意义的类别——事物的类概念。例如有一种樹叫 $X\ddot{a}XL$ (梧桐)，如意符“木”，寫成 $木X\ddot{a}XL$ 或 $\dot{a}XL$ ，这就表示着 $X\ddot{a}XL$ 屬于“木”类，但 $X\ddot{a}XL$ 只是樹木的一种，單用一个“木”并不能完全把它意义表示出來。所以我們想把这种意符又称为类别符号，而把帶有这种符号的拼音文字又叫做“标类拼音字”。

这类方案所用的拼音字母和标类符号是多种多样的，例如“梧桐”又可以寫成

木utung 权棲 余采

m-utung 枝桂 千叱叱

utungm

等形式。拼音方式多数是用双拼(最多用两个字母拼成一个音節)，也有完全音素化的，也有加声調符号的。类别符号有用到两百多个的，也有只用十來个的，一般是用几十个，这是由于分类的粗細有所不同。有少数方案是以詞为單位來标类的，但絕大多数的方案是每个音節标上

类别符号，不采用詞兒連寫的形式。

提出这种方案的理由，綜合起來有这么几点：

第一、認為漢語是單音節的，同音詞太多，不加意符就不能分別詞义；

第二、認為文字和語言不同，除了和語音联系外，还需要直接表示概念的符号來补充，这种無音符号在西洋文字中也使用了；

第三、認為这种文字的造字方法既采用拼音改造声旁，补救了老漢字的缺点，又因保留意符制度而有歷史根据，它是民族形式的，容易为大众接受；

第四、認為这种文字可以一个頂一个地代替老漢字，因此可以直接接受文学遺產。

由于有上面几点，他們就認為这种新文字既然有拼音文字的优点，又具有老漢字的优点，它是非常完美、最能解决文字改革問題的一种方案，至少是过渡到拼音文字的一座必要的桥梁。

*

◆

◆

标类拼音字的提出，一方面是把漢語中間的單音節作用和同音詞現象看得过于嚴重，一方面是受了漢字的深厚影响，不敢跳出它的圈子。因此他們提出的各种理由中最根本的理由就是上面所說的第一个理由。我們現在首先就这一点來談談。

漢語并不是純粹由單音詞組成的，可是漢文是由單音字組成的。人們因为看到漢字全部是單音字，就以为漢語的詞也全部是單音的，这是一种誤解。語言中間的詞是構成句子的意义單位（包括表示語法关系的那些單位），如天、地、人、太陽、月亮、桌子、石头、人民、國家、帝國主义、共和國……等等，都是詞，它們有的是一个字，有的是两个字，有的是三个字或四个字，或者还有更長的，所以漢語的詞有單音的，也有

复音的，不能認為純粹是單音的。

N. I. Konrad 說得好：“大家知道，北京方言有 420 个音節。既然北京方言是漢民族語的基礎，那么漢語就只有 420 个詞加上一些同音詞，而同音詞不可能特別多。这种情况顯然是不可想像的。……如果同一个音節有不同的聲調就意味着詞的不同和意义的不同，那么漢語的詞彙也就增加了一些。……因此，北方話里連不同聲調的也計算在內，共有 1,380 个音節。如果承認漢語的詞的單音節性，这只意味着全部北方話只有 1,380 个詞，再加上一些同音詞。当然，这也是不可想像的❶。”

同音詞不可能特別多，这是就語言的情况說的，因为太多了在說話和听话的时候，就会意义含混，使人家听不懂。由漢字字形分別造成同音詞，如果使得意义含混，到了口語里面自然而然要增加音節來分別它，例如“徐州”和“宿州”同音，人們就用“南 TU 叉”“北 TU 叉”來分別。如果同音詞不太多，那么北方話的單音節詞充其量不过二千多个，拿來表达人們思想中复雜的概念怎么够用呢？我們知道，一般詞典中收入的常用詞至少有两三万个，如《标准語大詞典》收詞三万多，《國語拼音詞彙》也是三万多。沒有这些詞，一般書报上的文章就寫不出來。如果不發展复音詞，怎么会有这末多的詞呢？打开这些詞典一看，也可以看出：复音詞不只是存在，而且它的数目比單音漢字多許多倍，而这些單音漢字又絕大多數不是單音詞。例如“鞦韆”的“韆”字，“矛矛”的“矛”，“彷彿”的“彿”，“徘徊”的“徊”，决不能单独表示意义，这是人人明白的。就是过去可以单独表示意义的字像“惕”“努”“警”“丽”等，到現在也不能单独表示意义，只能作为复音詞的一个音節，因而也不是單音詞。所以漢字虽然都是單音字，漢語的單音詞并不多。認為漢語是純

❶ 中國語文叢書《論漢語》，中華書局出版，30—31 頁。

粹由單音詞構成的單音節語，这种看法是不对的，應該說漢語是由一部分單音詞和大量复音詞構成的。

漢語既然有大量复音詞，詞形就会多样化，就会灵活地分別各种不同的意义。例如“利、莉、痢、俐、鬆、蝦”等單字，拼起音來虽然都是ㄉㄧ，沒有分別，但在詞形上是ㄉㄧㄞ，ㄇㄉㄧㄞ，ㄉㄧㄤㄧ（或ㄉㄧㄤㄧㄉㄧㄞ），ㄉㄧㄥㄉㄧ，ㄉㄧㄢㄉㄧㄞ，《毛詩》分得清清楚楚的。可見漢語的同音詞并不太多，而單音節的同音字現象，只要实行詞兒連寫，就基本上可以消滅。同时漢語还有声調的分別，这可以使同音詞的意义不混淆，例如ㄉㄣ这个音節，陰平是“分”，陽平是“坟”，上声是“粉”，去声是“糞”。拼音文字在必要的場合可以加上声調符号或声調字母帮助定型。另外还可以偶然采用地方音或特別拼法來區別同音詞。認為沒有意符就不能區別同音詞，这种看法是片面的。語言本身是有區別同音詞的办法的。如果因为过去拉丁化新文字工作者沒有充分注意到詞兒定型的工作就認為漢語純拼音文字根本不能定型，那也是一种誤解。

有些朋友怀疑詞兒連寫的可能性，認為目前知識分子用慣了單音節的方塊字，白話中还雜些文言，对語法缺乏研究，不会說北京話，我們要要求他們完全寫口語，按照北京話的音、調、詞彙，按照語法的規則掌握詞兒連寫，不是容易做到的事情。这种怀疑也是从过去拉丁化运动的情况產生的，因为过去拉丁化新文字的傳習，还只注意到字母、拼音規則、連寫規則和一份方塊字对音的音節表（檢字表），所有讀本都不过薄薄的几頁，并沒有把全部定型的常用詞教給人家，等于叫學習的人大家按拼音規則去創造文字，这自然是困难的。正好象學習漢字一样，如果只讀過單字表而沒有讀過漢字文章，当然就不会知道怎样正确地使用漢字來構詞和造句。英國学生如果没有从書上讀過 inkstand, blackboard 这些詞，也不会知道它們應不应该連寫。

另外也有人这样說：“惕”“努”“警”“丽”这类字在現在虽然不能單独表示意义，只能作为复音詞的一个音節，但它們是詞根，而詞根的意义在复音詞中間还是應該表現出來，因此还是應該加上义符。他們这样的看法，是由于不明白詞根意义的研究是語原学方面的事情，对于普通一般人并沒有絕對的必要，当然，有些常用的詞根，意义比較容易了解，同时因为这种詞根有孳生新詞的作用，了解它就有很多的方便，比方“警”可以造成“警戒”、“警衛”、“警报”、“机警”等等的詞，它的基本的意义是“警戒”，就是“注意防备”，這是我們應該掌握的。可是要掌握它的意义，只要教師把含有这个詞根的詞列在一起加以說明就够了，用不着加意符。至于象“惕”字这样的詞根，一般人就沒有了解它的意义的必要。这种情形，因為我們現在还使用漢字，不大容易弄明白，我想舉一种拼音文字的例子來加以說明。沙平著的《印度尼西亞語語法研究》在談到“簡單詞与原始詞①”的一節这样說：

簡單詞(韓按：簡單詞不等于單音詞)一般亦被称作原始詞，这就是說，这一类詞，自从最初產生的时候，就是这样的，和其他由别的詞轉变而成的詞不相同。

但其实簡單詞与原始詞依然是有分別的。原始詞绝大部分都是簡單詞，但簡單詞却不一定是最原始的。

最初的原始詞，大部分都是一些單音節的詞。这些最原始的詞，在現代印度尼西亞語中依然有若干殘存着。例如 sar (沙沙声) tar (的塔声)……

到后来，大部分的單音節的詞，都轉变为双音節或多音節的詞，而原來單音節的詞，則早已廢除不用了。

从語原学上研究，我們可以看出現在家所習用的簡單詞，大部分都不是原始詞，大部分是由更簡單的原始詞轉变而成的。这轉变的方式是：

1. 由原始詞重疊而成的。例如 tingting (叮噹声), gigi (牙齒)……
2. 由原始詞加上“接辞” de- le- ge- 等而成的。例如 desar (油煎声)

① 見該書第36—37頁，人民出版社出版。

legar (轟击)……

到后来 de-le-ge- 已不再被用作接辞，因此这一类的詞被認為簡單詞，甚至被認為原始詞……

3. 由两个詞合成新的詞。例如由 hulu (头) balang (兵隊) 合成 hulu-balang (指揮官)……

从語原學上看來，以上所舉的詞都是複雜詞，絕不是原始詞，但在語法學上則都被認為簡單詞，為的是習慣上人們早已忘却這些詞是由別的詞轉變而來，而把它們看作本來就如此的。

从印度尼西亞語這些情況來推想漢語拼音化以後的情況，將來漢語某些詞的詞根意義被一般人忘却是不可避免的。而且這也沒有加意符來故意避免的必要，因為把複雜詞當作簡單詞，在使用上並沒有什麼不方便。

其次我們要指出，數目不太多的同音詞，是各種語言中都有的，可是人家的文字並不用意符來分別同音詞。例如英語 platform 有“月台”“講壇”“黨綱”等意義，並沒有加上象土旁、言旁、系旁之類的意符來分成兩三種形式，train 有“訓練”“瞄准”“指導”“列車”“乘車”“隨員”“拖曳物”……等意義，也沒有加上言旁、手旁、車旁、人旁、牛旁等來分成多種形式。俄語的“和平”和“世界”都是 мир，也沒有加意符來分別。這些詞的不同意義到了語句中間，有上下文幫助，是可以分別確定的。而且文藝作家還往往利用這種同音詞現象來寫一些有雙關意義的話，使人物的性格在語言的矛盾中表現得更深刻而生動。Г. 林諾卜爾《語言和性格》① 那篇文章中談到高爾基利用一字多義的手法，有一個例子是這樣的：

梅爾尼科夫(區審判員)企圖使瓦莎相信他的“感激”(Благодарность)。

① 轉在《文藝報》1953年24號上。

瓦莎打斷他說道：“您說話簡短些！等我們把這件事辦妥後我們再談報酬（Благодарность）。”

瓦莎·日耶列茲諾娃把詞的另一個意義（Благодарность——報酬）來代替原來的意義（Благодарность——感激），輕而易舉地順便揭穿了梅爾尼科夫的花言巧語的虛偽，暴露了他的本意。這裡就表顯她確實有能力。

由此可見，俄文“感激”和“報酬”是同音詞，在字形上毫無分別，有時候在話里面有雙關意義的，像上面的梅爾尼科夫的話就是，但是從一定的上下文裏面又可以確定它的意義，像上面瓦莎所說的話就是。語言本來有這樣的現象，用不着拿意符來掩飾它，所以俄文不用意符。

英、法文中有些詞有不發音的字母，如 know 中的 k，這並不是直接表示某種概念的無音符號，而是歷史上遺留下來的拼法，過去這種字母是發音的，因為語音轉變才不發音了。英文中 inn 和 in 的拼法不同，可能是為了區別同音詞，但這不過是偶然應用特別拼法，n 幾乎不是代表一個概念的意符象漢字“旅館”的“食”旁之類。還有人把歐洲文字中詞尾字母看作區別動詞名詞等等的意符，這也是一種誤解，那些詞尾字母是代表語言本有的聲音的，並不是硬加上去的無音符號。總而言之，把附加意符當作一般文字所以和語言分別的特點，是不符合事實的。這種特點只有象漢字這樣的表意文字才有。一般文字和口語的不同點，只在於文字這種書面語不是直接從聽覺來了解的，而是經過識字教育把聽覺和視覺結合起來培養了閱讀能力之後通過視覺來了解的。文字不一定要有不發音的意符，如果是拼音文字，它的個別音符雖然不表意，但由一些音符結合起來所拼寫的詞兒本身是意義清楚的。漢字之所以要附加意符，是由於它的音符（形聲字的聲旁）太複雜，表音不準確不細密，又不能按照語言的意義單位來連寫，因此不能正確地表達語言的意義。

第三、文字改革既然走拼音的道路，就必须抛开表意体系的方塊字，采用字母拼音的制度來拼寫現代的漢語。所謂民族形式，对于拼音文字說，主要是語音形式，構詞形式和詞形变化形式等等。拼音文字需要適合于它自己的新民族形式，不能拿表意文字的旧形式來为拼音文字服务。

屬於表意文字体系的形声文字并不是漢民族所独有的，在西方，古代埃及的聖書字，巴比侖的楔形字，都包含了形声字；單音節文字也不是漢民族所独有的，Semit 語是多音節的，但它过去的文字是單音節的❶。我們应当認識到表意文字只是世界文字發展史的一个阶段，形声字不过是表意文字中帶有表音成分的一种，而單音節音符也不过是由表意文字过渡到表音文字的萌芽阶段的一种形式。在原則上，这些都不能算为民族形式。在具体的文字形式上，当然漢字有漢字的特点，但是到了拼音文字阶段，在原則上已經否定了表意体系，这些特点就成了應該否定的旧形式了。

表意文字的重要原理是企圖給每个不同的概念造一个不同的符号，但是因为这种符号事实上不过是古代象形文字簡化出來的，不可能無限制地增加。如漢字的“日”“月”是由表示太陽和月亮形象的象形字改变成功的，这一类是意符文字的主要部分，所謂会意字原是由單体象形字構成的合体字，再加上少数的象征性符号（就是所謂指事字），这是純表意文字的全部。据清代文字学者王筠的統計，《說文》全書單字 9353 个，其中象形字 264，指事字 129，会意字 1260，三种合計也不过 1653 个。表意符号有限，而表达概念的新詞層出不窮，又不得不拿这样的符号兼充音符來应用或用它來配合意符造字。于是產生了大量的假借字和形声字，特別是形声字。在形声字里面，由于有音符的帮助，

❶ 參看高名凱《普通語言學》上冊第 160—161 頁。

意符只要能表达一些类概念就够了，不必分得太細；因此这种包含了表音成分的表意文字就能適应几千年來文学語言的發展而尽了它的歷史任务。这种表音成分（形声字的声旁）可以說是这种文字的進步因素，但是由于它是音節符号，不是音素符号，不能分出元音（母音）輔音（子音）來，缺乏自由拼切的灵活性，表音不一定准确精細。而形声文字中間的音符，因为有意符帮助，也可以不要求准确和精細。形声字虽然含有表音成分，原則上还只是表意文字，而不是表音文字。人們对于这种文字，既然不注重讀音的准确性（統一性），或者曾經注重过而不能实现，也就可以听任各方言区讀不同的音，因此文学語言讀音很不統一，各大方言区之間不能用來交谈，而形成了在方言分歧情況下文字仍然統一的現象，这一点往往是人們認為漢字优点的所在。其实这种优点只有在書面語和口語分家的文言文时代才存在，到了人們要用文字記錄口語的时代，这就不是优点而是嚴重的缺点了。人們要用文字記錄語言，而表意文字走着脱离語言的方向，它不用灵巧而簡便的音符來忠实地精密地記錄有声語言的音，通过語音形式來表达意义，而用無數复杂的各各独立存在的符号來直接表示不同的概念，強調語义以外的所謂字义。由几百个原始形体演变出來的各种合体字，結構是異常复杂的，其中意符和音符既沒有形式上的差別，也沒有确定的地位。每个字的意符或声符都可能随时改变，并不固定，如“轔、鞶”可以变成“靴、鞋”，“猪、貓”可以变成“猪、猫”。一个音可以用几个不同的音符，一个音符又可以表示几个不同的音。有人計算現在北京音念 1 的这个音節 177 字中，用了“以乙衣父意臣医益易台义壹夷矣已異父世伊多敷弋邑亦失罪乞夜奇也革葺宜貴”等 34 个音符，自然这 177 字在古代乃至在現在某些方言中并不都是同音的，但現在北京音是同音而用了很多不同的音符。至于一个音符几个音的例子也是常見的，如“各”在“洛絡”

“烙”等字中和在“格客烙……”等字中分別表示了 l 音和 g、k 音。这种書寫制度把每个音節造成了独立运用的單位，而且同音異義的單位無限增加，几千年來積累到了六万多个❶。这种表意文字，在文字对于一般民众日常生活的关系还不很密切的时代，在文字只被封建士大夫主要用來作为創造書法美術品或对对子作回文詩等文字遊戲的时代，还是適用的，但是到了現代，經濟文化飛躍發展，白話文已經占了統治地位，一般民众積極要求掌握文化，它的毛病，它的內部矛盾就尖銳地暴露出來了。五四以后用这套文字來推行白話文，虽然在詞彙和語法方面已經在全國範圍內达到了一定程度的統一，但是在語音方面始終沒有一致的标准。假使白話文不是用表意的漢字書寫，而是用拼音文字書寫的，讀音一致（或大体一致）的民族共同語一定隨着这三十年中的語文教育而通行全國了。所以今天我們覺得漢字能作为方言紛歧情況下的統一的文字，这并值不得驕傲，它的妨害語音統一教育的坏处倒是非常顯著的。因此它的不緊靠語音而着重以符号直接表意的主要原理和書寫制度應該被推翻，我們要以通过語音和語詞形式來表意的拼音文字的原理和書寫制度來代替它。只有密切地結合現代漢語的拼音文字才簡便灵活，好学好用，容易为大众所接受。只有密切結合現代漢語标准語的拼音文字才能够成为全國漢語区真正統一的文字，在形音义各方面都完全統一的文字。

总而言之，無論老漢字在过去的民族文化史上有多么大的貢獻，到了它的歷史任务完成的时候，它的表意体系就应当讓位于新的漢字体系（拼音体系），正好象犁耙对于我們的農業有極大的貢獻，終于不得不逐渐为拖拉机所代替一样。文化的民族形式應該是隨着时代的進步而向前發展的，我們不承認有什么永远不变的民族形式，因为这是可能成

❶ 見 1938 年商务印書館《中山大辭典》的自序。

为文化進步的綽脚石的，这实际上只是保守的國粹主义的擋箭牌吧了。

第四、漢字的單音節形式既然和語言的意義單位不符合，拼音文字就不應該一个頂一个地來代替它，而應該按照現代語言的詞來拼寫。事实上要做到頂替漢字，也不能面面俱到。比方把声旁按照北京音拼寫，就不能象漢字一样適合各方言区隨便讀音。北京音同音字如“議”和“誼”，“訣”和“誦”，“溢”和“液”之类，部首相同，意义还要靠不同的音符來分別，現在把音符部分改成統一的拼音形式，就失掉了漢字原有的特点。就意符來說，更難做到一个頂一个。如女部有奸、姦、嫉、妬、妾、妖、嬾、媯、媿等坏字眼，已經有很多人反对；鯨字的魚旁，蝙蝠的虫旁，也是現代人所不能滿意的；驕字的馬旁，矜字的矛旁，現代人不知道它講的什么；勝臘膳等字的意符本來是“力、貝、言”等，但是一般人都以為是那個月字，却又不知道代表什么意义；此外如桥字杯字的木旁不能包括铁桥石桥瓷杯玻璃杯等等，更是普遍的情形；这些偏旁是不是要重新拟定，而且拟定以后能不能適合將來事實的發展，都是問題。还有一个矛盾，就是适合現代事實的未必適合于古代（如驕字原意是六尺高的馬，仍然應該用馬旁），可能在改变以后会不便于接受文化遺產了。因此我們覺得标类拼音字对于翻印古書也並不適用。

就漢語拼音文字來說，它既然應該拼寫現代語言，那就不應該有什么直接接受古代文学遺產的企圖，因为那些文学遺產不是用現代語言寫的，必須由專家翻成現代語言，才能够讓一般人接受。其实認識漢字并不等于了解古代語言，所以有些能認識古書上文字的人并不了解它的內容。如果要学古代語言，可以当作另外一种課程來學，用不着混在現代語一起。如果要使古代文字拼音化，也得根据專家研究的成果，另外按古代語言拼寫。王力教授过去建議的“文言羅馬字”^①就是这样的

①看王著《漢字改革》那本書，商务印書館出版。

一种方案。如果用这一类的拼音文字來改寫古人的文章，由于古語音節比現代北方話音節丰富得多，所謂同音異義的混淆也不成問題，因而意符也沒有保留的必要。

从以上几点看來，拼音文字和表意文字是根本不同的两种体系，而文字發展的規律是由表意文字向拼音文字前進的。漢字中的進步因素是其中的表音成分，不是表意成分。表意文字的主導原則是使書寫語詞的一部分符号脫离語言直接表示概念，这是和拼音文字的主導原則不能相容的。拼音文字是按照語言書寫的，是完全通过語言的形式來表达意义的，它不能采用脱离語言的概念符号。如果加上这种符号，这种符号將成为贅瘤，而整个文字也是非驢非馬式的。那末，标类拼音字是不是可以作为由方塊字过渡到拼音文字的桥梁呢？我以为在文字改革的过渡时期可以采用下列几种办法：1) 拼音文字文章和漢字文章对照；2) 拼音文字文章夾用漢字；3) 漢字文章夾用拼音文字；可是不必采用麻煩的标类拼音字，因为它多用了許多需要死記的符号，还要束縛拼音文字，使它不能灵活地記錄天天在發展着的語言。标类兼标調兼帶其他區別符号的拼音文字如果是采用拉丁字母的，也許有一个用处，就是打漢字的國際电报。

(54年12月号)